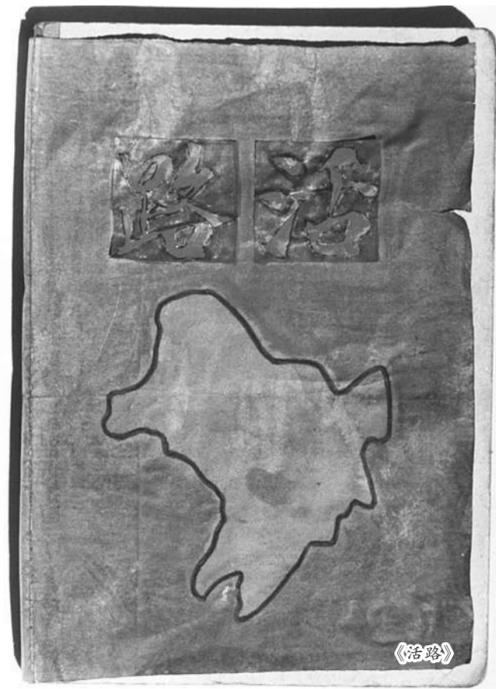


“东北有魂 东北不亡” 《活路》背后的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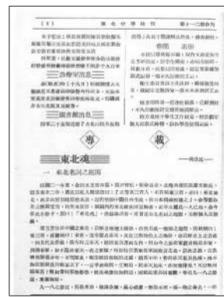
高劲松

笔者的爷爷高崇民先生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、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，一生立场坚定，襟怀坦荡，刚直不阿，光明磊落，曾被周恩来称为“东北人的榜样”。

笔者收藏有一系列他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抗日文章，尤其是《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之组织与战绩》《东北魂》《活路》等，体现了他抗日思想的精髓，反映出他抗战思想的成熟、深邃和坚定。



▲救国旬刊



▲东北中学校刊登的《东北魂》

东北魂就是中华魂

在《东北魂》一文中，高崇民坚持“东北”是中国的领土，从“东北”一词的由来，以东北历史发展的角度，分析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绝不是什么孤立的“满洲”。东北被日本侵占，所有东北人只剩一个身份：“亡国奴”，只有一个共同敌人：倭寇。

“我们要不分富贵贫穷，男女老幼，何党何派，都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。”这是在呼唤抗日统一战线。“东北爱国志士已团结形成一个集团，这个集团名曰‘东北魂’。东北有魂、东北不亡。”东北魂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可战胜之魂。

《东北魂》通篇讲的是抗日，但是，为了回避国民党当局“言抗日者杀勿赦”的命令，在10000多字的文章中从头至尾未出现“抗日”之字样，高崇民巧妙地使用了诸如：“日本侵略”“敌愾之气”“志在收复”等词语，表达了东北人民抗日复土的愿望。

《东北魂》完整地表达了高崇民的抗日思想理论，充分体现出他的睿智与才华。1933年此文在东北中学校刊发表，在社会各界，尤其在东北人中引起强烈反响，称赞它是一篇抗日的檄文。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将此文带到黄埔军校，在东北学员中传阅，更是反响强烈，阅读者无不称赞写得

东北军的出路在抗战

小册子《活路》是1936年3月高崇民等人编辑出版的。在西安事变之前，高崇民把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们对抗战的疑问

和质疑，比如抗日由谁来领导？日本武器先进，中国能打败日本吗？抗战胜利最终要依靠谁等等，整理成《抗日问答》，用问答的方式撰写共计5000字。

高崇民在《活路》中明确提出：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，建立西北抗日大联合，建立根据地，改造东北军，东北军出路唯有抗日等主张。小册子由十七路军秘密印刷散发后，人们争相传阅。《活路》中《抗日问答》编写得通俗易懂，又不涉及战略和具体问题，特别适合中下层军官和士兵阅读。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“联共、联苏、联西北军”的战略思想，即组织东北军、西北军和红军“三位一体”的西北大联合，明确地提出反对内战，联合对外。为东北军指出了一条活路，在东北军、西北军中反响强烈，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。

《活路》出版后，我党负责与十七路军联系的交通员梁明德立即送给毛泽东。毛泽东阅后认为：《活路》中“三位一体”联合抗战的提法很好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随后，红军总政治部翻印《抗日问答》3000册，作为红军政治教育的教材。

服从中央安排，入党手续后办

高崇民很崇敬孙中山先生，在孙中山先生1924年改组国民党，推行新三民主义、

联合工农后，加入国民党。

1929年，高崇民作张学良秘书时，曾营救刘少奇（化名成秉真）等多名共产党人出狱脱离危险。

1935年5月，他回顾自己抗战奋斗17年，总被国民党所镇压或取缔而失败，而共产党却割不灭，打不垮，始终坚挺的经历。敬佩之余，开始思考。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的帮助下，“幡然醒悟，方悔恨自己过去太瞎摸海了，活到45岁才明白做人的道理”。从此，他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，追求民族解放，追求共产主义。他烧毁了国民党证，一心一意跟定了共产党。

他第一次与共产党协作，就是参与策划西安事变。

1938年，高崇民率领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观团到延安考察，向党中央正式提出入党的申请。他曾经回忆当时周恩来和陈云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入党，条件完全具备，无非是一个手续问题。但我们认真研究后，觉得你不入党，以现在的身份工作，作用会更好、更大、更安全。”

高崇民思考片刻后，表示遵从党中央的安排意见。从此，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完全接受与服从党的领导，全身心积极主动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工作。

直到日本投降，高崇民在周恩来安排下潜离重庆，回到阔别14年的家乡东北。在中央的指示下，1946年7月，他正式办理了

入党手续，但仍是秘密党员。

三次被通缉抓捕

1933年9月，高崇民、阎宝航等爱国人士在“救国会”被取缔后，又秘密成立了“复东会”，坚持秘密斗争，决不屈服。他们的抗日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满与敌视。

1934年初，张学良回国。蒋介石利用张学良的想法，建议他组织“四维学会”。高崇民等人坚决反对成立“四维学会”，认为这是蒋介石妄图取消“复东会”的阴谋。高崇民说：“‘四维’的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根本与国内民族危亡、要抗日救国的大形势挂不上边。一点抗日的意义也没有。”张学良派人来做工作，双方争执了5个小时。

最后，在张学良的一再坚持与强调之下，高崇民等人尽管心存疑虑和不满，又觉得不能为此得罪张学良，而失去抗战的力量，被迫同意，坐看事态的发展。

正如高崇民所料，“四维学会”成立后，蒋介石利用其取消“复东会”的目的达到了。1935年6月26日，在汉口召开的“四维学会”理事会议上，高崇民拂袖退出会场，其他坚持抗战的东北爱国人士也随之退会。

从此“四维学会”便名存实亡。此后，高崇民受到蒋介石的第一次通缉。

1936年3月高崇民参与编写《活路》小册子，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，其思想宣传鼓动作用之大，是始料不及的。《活路》只印发了一期，即被国民党查禁。但是，越查禁，人们越想看，影响也越大。

为此，蒋介石以“宣传赤化罪”第二次下令通缉高崇民。张学良得知后，密令王以哲和刘多荃将高崇民送往天津躲避。

1940年，高崇民决定营救杜重远，他被骗到重庆软禁起来。在重庆软禁的5年里，高崇民首先加强“东北救亡总会”的领导，坚持兴办《反攻》杂志，成立东北民主同盟会，输送了大批青年参加革命，迎接东北及全国的解放，这一切工作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。

1945年11月22日傍晚，高崇民照常抱女儿外出散步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突然有一身材与他相似、穿着一样的人抱住女儿，继续前行，行走小转弯。高崇民迅速拐弯消失的人群之中，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跟踪，直奔朝天门码头而去。他顶替张友渔的名字与其爱人韩幽桐假扮夫妻，持票登上美国邮轮，冒险离开了重庆。

发现高崇民潜逃，蒋介石勃然大怒，以“叛党潜逃罪”发出第三次缉捕令。但为时已晚，他已到了上海，后经天津、北平回到东北。

（作者系高崇民孙女、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学院副教授）

北京沙燕风筝 “狮子滚绣球”

杨蕾

风筝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最初名为“鸢”，作军事、通信等用途。唐代开始出现“纸鸢”。到了五代，有人在鸢上绑响器，空中放飞时会发出轰鸣声，后人称为“风筝”；北宋后，风筝开始流行于民间。风筝作为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融入民间文化后，经过千年演变发展，产地众多，流派纷呈。



▲狮子滚绣球 马家树 风筝 38×38cm 1967年

其中，北京风筝在中国风筝艺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北京风筝深受皇城文化的影响，已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在讲究扎、糊、绘、放的同时形成了特有的风采。北京风筝最具代表性的是沙燕风筝，它是集雍容华贵风格和特殊艺术形式于一身的风筝样式，尽显老北京的文化。

马家树创作的北京沙燕风筝“狮子滚绣球”，以蓝青色描绘，俗称“蓝锅底”。尾翎、膀梢留白的漩涡纹和羽毛纹均匀对称，有秩序感，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意境。胸腹、腰拴天蓝色勾白边的团云纹，衬托着一对正在踏云嬉戏的绿身红毛狮子。温润典雅的蓝色与热烈喜庆的红色，形成冷暖对比的视觉冲击，画面和谐活泼，笔触细腻流畅，形象惟妙惟肖。题材选取祥瑞之兽——狮子，左侧的雌狮憨态可掬，右侧的雄狮蓬头大耳、脚踏绣球，飞舞的明亮的红黄飘带更是点睛之笔。因“狮”与“事”谐音，故引申为“事事如意”，彰显吉祥如意、祈福消灾的寓意。此件风筝造型完美、颜色雅致、图案考究，处处都寄托了对美好、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。

贵州织金苗族 花卉纹纹绣背扇

陈真



▲贵州织金苗族花卉纹纹绣背扇 刺绣 78×60cm 20世纪60年代 2012年马正荣捐赠

贵州织金苗族花卉纹纹绣背扇的主图案为传统的鸡冠花纹样，其花团锦簇、鲜艳如火且花期长，象征炽热的爱情与长命百岁，还有辟邪祛病之意。

此纹样朴拙尚未脱离早期的粗线型，在花朵之间施以白色纹绣，红白相间增强了纹样的立体感与厚重感。背扇上端垂挂的红色流苏，分别缝缀如意云纹和鱼形的绣片，与背扇相得益彰，色彩亮丽，装饰性强，更显活泼欢快。如意云纹寓意吉祥美好，鱼象征年年有余、多子多孙。其中，鱼形绣片上还绣有蝴蝶和鸟纹。

背扇构图严谨复杂，为了烘托中心部位，一般由内而外，分多层设计，有二连方或四连方甚至更多，分别以万字纹、几何纹、花藤纹、马蹄纹等作为外框的缀饰。其中的勾线、直线、折线、曲线等，或三条平行的饰带，皆凝练成高度抽象的文化符号，以示祖先迁徙的历程。

背扇手为两条黑色绣有花藤纹样的带子，简洁而又淡雅，它将孩子紧紧地维系在母亲的身上，形影不离。因此，背扇带被人们喻为“连接母子亲情的生命带”。一件背扇往往施以多种技法才得以完成。纹绣虽耗时费力，却与鸡冠花的特点十分契合。纹绣需事先制作梗线，以粗麻线或棉线为芯，将丝线紧密缠绕在上面做成梗线，再将梗线沿着鸡冠花的边缘进行盘绕，用针线缝上，加以固定。这样，一朵朵轮廓分明、丝绒质感的鸡冠花纹凸显在背扇正中，格外美丽夺目。

除纹绣外，还辅以平绣、钉线绣和锁绣等，更加立体而有层次，其厚实的质感使背扇经久耐用。此件背扇构图饱满，技艺精湛，制作精良，古朴凝重，色彩柔和，内涵深邃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背扇精品。

建鼓铜座



▲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

湖北省博物馆藏建鼓铜座出土时位于编钟短架尽头，鼓皮已朽，仅存鼓腔、贯柱及鼓座。中室还出土有两件建鼓铍。

建鼓铜座的铸造采用了分铸、铸接和焊接相结合的方法，由8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缠绕的小龙构成，龙身镶嵌绿松石，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。

建鼓过去仅见于战国和汉代的青铜纹饰和石刻画像，此件是已发现最早的实物。

徽王庄石桥的前世今生

赵传昌

屐痕处处

徽王庄石桥位于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徽王庄村东200米处马颊河（旧称赵王河）上，石桥年代久远，距今约800年，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800年来，徽王庄石桥历经岁月沧桑，饱经战火侵袭，见证了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。而今矗立马颊河上的这座大桥，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的桥梁，由原来的十三孔缩为现今的七孔。修建所用的砖石、檩条、横梁、古砖、石碌碡、镇河吸水兽头等都是原桥拆卸下来的老物件。

古桥原貌



徽王庄石桥吸水兽头

徽王庄石桥始修于金代。一共十三孔。东西走向，石墩旧圆柱木面。主桥50余米，护坡30余米。桥高5米，桥宽6米。桥墩由42根石柱组成，一排3个，纵向14排，石柱由8至10个碌碡组成。

每排石柱之上架横梁一个，横梁之间有12根檩条用卯榫相连，一共14架横梁156根檩条。檩条之上铺满密集的椽木。椽木之上盖芦苇编织的苇把。桥面是灰土调拌而成，坚实而坚硬。两侧镶有木栏杆。护坡桥头由古蓝砖构筑，在高4米处镶有吸水兽头。这兽头是水文标尺，也是防汛最高警戒线。

清代乾隆时期《德州志卷十二·艺文》载有清李世垣《募修兴龙寺大桥疏》，其中写道：“石桥者，金时所建，明人称为徽王庄桥是也。”清代康熙德州志也提到徽王庄石桥的名字。



徽王庄石桥

立镇水兽狮子2个，其双目圆瞪，张嘴獠牙，肃穆而充满震慑。

古桥被烧

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向山东进发，沿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地方团武装组织抵抗，也阻挡不了日军的攻势。山东保安第五旅曹振东部为阻止日军汽车运输，一夜之间在陵县、德县境内烧毁了7座桥梁。日本侵略者来到徽王庄村，抱取村民刘朝阳的高粱秸秆当引火，用洋油点燃，将这座古桥的两孔烧毁。

1937年冬，国民党西北军冯治安部败退到石桥，在徽王庄村大卸房门，用门板搭建木筏渡河，激流中翻覆淹没，淹死了不少官兵。1938年春，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拨款专款500大洋用于维修石桥，徽王庄村首事（相当于村长）刘云卿负责修桥事

宜，但他没有专款专办，修桥款被挪用于他开办的作坊。后省党部追查修桥款下落，刘云卿怕治罪，他打通州县关系又将修桥款悉数退还。

1942年春，日军在石桥西侧100米处修建军营（保险院），顺便把烧毁的两孔石桥用木料简易搭建，但只能走人，不能过车。当时徽王庄村民去河东种地收庄稼，用木船摆渡运输，枯水季节车马从干涸的河床穿梭，十分不便。

石桥重修

1950年秋收过后，断塌的徽王庄石桥由于岁月久远、风雨侵蚀已破烂不堪，如果不及时间修建会给附近村庄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。重修石桥的呼声日益高涨，为此，中共徽王庄区委召开修桥会议，成立修桥委员会。修桥资金、物资、施工人员，按村摊派。

1950年冬天修桥正式开始。新修的石桥，由原来的十三孔缩为七孔，由27个石柱支撑，护坡是古蓝砖白灰条，按原先古桥放置吸水兽头的4米高位垒砌了8个吸水兽头。上梁时用8个横梁96根檩条构建，密架椽木之上铺盖苇板，桥面用灰土铺平，木工用硬榆木制作了结实的桥栏杆，中间贯穿了铁链，新修的石桥于1951年5月竣工。竣工后附近村庄的人民欢欣鼓舞，剧团在徽王庄村唱戏7天，以示庆祝。中断了14年的徽王庄庙会也随之恢复。

沧海桑田，时代变迁。那些为修建石桥呕心沥血的干部群众、施工工匠、杂工以及无私奉献钱物的人民群众，也已隐入历史。但他们的功绩永在，石桥沿岸村庄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

（特此鸣谢本文采访人员孙印，男，1933年生，91岁，徽王庄村人；刘凤桐，男，1935年生，89岁，徽王庄村人；刘培升，男，1938年生，86岁，徽王庄村人。）

（作者系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）